Asia Pacific Science Publications Co., Ltd.
亞太科學出版社
APSP

亚太社会科学
ISSN(O) : 3080-2121
ISSN(P) : 3080-2113
2026 年第 5 期

一手档案与“他者”视界：东亚同文书院对华调查手稿的史料学价值与活化路径

胡竹清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版权说明：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与学界已经研究得较为充分的“满铁”资料相比，东亚同文书院近半个世纪、约五千名毕业生留下的近两千册原始调查手稿，长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本文从史料学与中日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厘清书院资料从原始手稿到公开出版物的编辑过程中，日方对其中的军政信息与敏感记录等做了删改，造成文献失真。在此基础上，阐释原始手稿在还原微观社会经济数据、补充官修志书、提供“他者”视角与揭露日本对华情报工作的三重史料价值；剖析其藏地跨国分散与手写草书体识读等利用瓶颈；并提出文本对读、史料互证及结合 AI-OCR、GIS 与知识图谱的数字人文活化途径，以期将这批特殊档案转化为滋养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学术宝库。

关键词：东亚同文书院；原始手稿；史料价值；活化路径

DOI：https://doi.org/10.62177/apss.v2i5.1872

一、近代日本对华调查史料体系中的书院手稿

近代以来，日本组建了以官方机构外务省、农商务省为核心，以“满铁”、东亚同文书院等机构为辅助的“官民一体”情报网络，在华开展情报调查活动[1]。“在众多日本对华调查机构中，满铁调查部与东亚同文书院分别是官方与民间调查的代表。”[2] 然而，战后两者在学术研究中的境遇却呈现出极大的“冷热不均”。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满铁”的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与东北经济档案便被中美日学界（如黄宗智、杜赞奇、马若孟等）深度挖掘[3]，“满铁研究”很快成为热点研究领域。反观东亚同文书院（以下简称“书院”），虽然它开展的调查时间跨度更长，调查覆盖面也超过满铁，但数量庞大的调查档案长期处于“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3][4]，档案价值和学术利用程度很不相称。

作者简介：胡竹清，男，汉族，陕西咸阳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日本的中国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5XZS012）。

梳理国内既有研究，可以发现一个史料使用上的误区：不少早期研究主要依靠日方整理出版的二次汇编文献，如《中国省别全志》《新修中国省别全志》等。这些出版物固然展现了书院对华调查的整体框架，但在史料学形态上均属于经过后方编辑、归类、甚至政治筛选的“二次文献”。而书院学生在实地调查后形成的一手原始手稿（包括《旅行日志》《大旅行调查报告书》），在交由东亚同文会本部或书院中国研究部整理出版为公开图书时，为掩盖调查的真实动机，大量军政相关记述、分析评论以及实测地图都遭到删改。更为关键的是：书院原始调查手稿因时代变迁分藏在中日美等不同国家，加之日文手写原稿识读门槛高，以至于国内学界长期未能将研究重心由“二次出版物”推进至“一手原始手稿”的微观解构层面。

鉴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书院调查资料的生成演变与剪裁机制，区分出三类不同层级的史料。然后从“一手档案”与“他者视界”双重视角，阐明手稿对于还原清末民初基层社会经济实况，以及揭露日本对华情报活动的独特价值。最后分析书院资料利用受限的现实原因，提出可行的开发路径，以期让这套沉睡百年的庞大一手史料，真正服务于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日关系研究。

二、一手手稿与二次出版物的史料学辨析

（一）调查体制与原始档案的生成

书院的对华调查档案，与它独有的“大旅行调查”制度紧密绑定。这项活动既是教学环节，本质上也是情报搜集活动。自 1901 年书院创办，至 1945 年随日本战败解散，每届毕业班学生都会分为若干小组，被派往中国各地开展 2～6 个月的专题实地调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约五千名书院学生参加了“大旅行调查”，旅行线路多达 700 条，遍及除西藏外的中国所有省区[5]。调查结束后，学生撰写《大旅行调查报告书》（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书》”）提交书院，以代替毕业论文。这些调查报告书“每年印 5 份抄本，分别提交给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在东亚同文会和书院也各保存 1 份。”[6]

从调查报告书的撰写到递交的整个流程可以看出，“大旅行调查”自诞生起就带有浓厚军政情报色彩。大旅行的经费主要来自日本外务省，参谋本部、农商务省也提供部分资助，调查工作本身就服务于日本对外扩张的现实需求[7]。学者王刚对书院调查档案制作流转过程的研究显示：书院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原稿仅有一份，上交书院之后，再寄回日本东亚同文会总部。总部组织人员誊抄复制，形成多份副本，交由外务省，再分发给参谋本部、农商务省，也可供其他相关部门调阅使用。并且，东亚同文会作为书院的主办机构，完全清楚调查报告会提交给军方参谋本部这一事实。这种“由外务省资助、学生野外实测、副本直呈军政部门”的闭环流转机制足以说明，书院手稿绝非普通的海外游学记录，而是披着“修学旅行”外衣，服务日本对华战略的情报档案。

（二）书院史料的三级划分

集合史料生成源流、文本原始性、物理保存状态，参考前述王刚对书院调查手稿的分类，书院对华调查文献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层级：

一级史料：原始手稿（正本）。即学生实地调查结束返校后，写在十六开美浓纸上的日文手稿，主要是《旅行日志》《大旅行调查报告书》，书写多为日文行草字体。

二级史料：机构誊抄本（副本）。东亚同文会或书院本部为方便内部归档和部门调阅，安排誊抄人员把原始手稿撰写成工整规范的日文，装订成册，即为誊抄本副本。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和日本爱知大学（以下简称“爱大”）收藏了书院的主要调查档案。国图收藏的为第 24–40 期（1927–1943 年、1936 年缺藏）学生的调查报告书（约 800 本）和旅行日志（约 1000 本），其中既有原始手稿，也有复写本[8][9]；“1943 年以稿本为主，其他旅行年份也间或有稿本，余者多为复写本。”[10] 爱大所藏为第 13–32 期生（1916–1935 年）的誊抄合订本。

三级史料：公开出版汇编本。东亚同文会组织教员与编辑，对书院原始调查资料进行重新归类整理、删除敏感信息后，面向社会或特定官厅公开发行的商业与官用书籍。代表性出版物包括《中国经济全书》（12 卷，1907–1908）、《中国省别全志》（18 卷，1917–1920）以及《新修中国省别全志》（9 卷，1941–1946）。

（三）一手手稿对二次出版物的剪裁失真

以往不少研究误将《中国省别全志》这类公开出版物等同于书院对华调查的全貌，忽略了编辑阶段极为严苛的政治筛选与“去敏感化”剪裁机制。通过将国图、爱大藏原始手稿与公开出版物进行逐篇对读，可以清晰揭示出版物存在的明显的内容缺失。

1. 军政内容的系统性剥离：书院学生在进行大旅行调查时，“调查班分班方法一般是‘商务科'与‘政治科'学生搭配，后者专门负责调查政治、军事类内容。故调查班成员中有‘政治科'学生者，其报告书中都有政治、军事类内容，其篇幅或为一卷，或为一编，或为数章。然而，在编纂《中国省别全志》时，各编标题与报告书中同级标题颇为相似，却独不见有政治、军事类的‘编'，甚至也没有这样的‘章'”，出版物呈现出纯粹商业地理与民俗志的面貌，掩盖了其兵要地志的本质。再比如，“昭和十五年度长江流域调查第八班中村文雄的调查报告《支那事変と漢口の物資》，在收入《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东亚调查报告书》（昭和 15 年度）一书时，除了目次有所变动外，还删除了手稿中的‘右の表は漢口宣撫用物資配給組合の調査に依るものである'这句话，该句话的右边标注了‘祕'字。”可见一手手稿在变成出版物的过程中，内容经过严格筛选。

2. 实测地图的巨量剔除：原始手稿中附有大量由学生沿途实测的手绘高精度地图，包括隘口地势、水深航道、桥梁承重、驻军营房及村落小径。据学者王刚估算，地图数量“十年下来，应该有数千页”。反观正式出版的《中国省别全志》，广东卷仅收录 37 幅地图，广西卷 38 幅，云南卷只有 19 幅[11]。大量涉及军事安全的实测精细地图在出版时被人为有意剔除。

由此可见，原始手稿可以修正公开出版物经过修饰之后带来的史料偏差。这批档案时间跨度大、地域覆盖完整，保留了未经加工的原始记录，既是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实况的一手材料，也是日本开展情报搜集活动的实物证据。

三、书院调查手稿的史料学价值重估

将研究视角由公开出版的“二次文献”推进至“原始手稿”后，书院对华调查档案所蕴含的真实史料学价值得以被全面重估。这批跨越近半个世纪、覆盖中国绝大多数省区的原始手稿，未经后期的修饰裁剪，既留下了大量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微观细节，更以“他者”的特殊观察视角弥补了中国传统方志的局限，同时还留下了日本对华情报工作的历史铁证。

（一）未经删减的微观社会经济数据

与中国传统方志侧重行政建置、文人考据及宏观描述不同，书院调查报告“受欧洲实证主义方法的影响，被要求注重事实与具体数据”[12]。原始手稿保留了大量未经编辑删除的微观经济社会数据，对研究近代中国以工业化和商品化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精度极高的资料。

1. 金融通货与商业习惯实态：原始手稿详细记录了各地的金融通货情况，以第 26 期学生生二川薰撰写的“太原、大同、张家口、石家庄的金融状况”一文为例，该调查报告详述了四地的新式金融机构（如山西省银行、中国银行太原分行），旧式金融机构（钱局、钱庄、银号、票庄、当铺、换钱铺子）、通货（银两、银元、铜元、纸币）及其实时兑换比例，汇兑及金融情况[13]。商业习俗方面，第 16 期学生《上

海的招牌》一文，细致记录了招牌的沿革、性质、文字、配色、禁例、分类情况 [14]。

2. 微观产业技术与水陆运输成本： 手稿记录了各地农林畜产与手工业的技术细节。如各地油房榨油（土法榨油槽数、出油量与作坊规模）、烟店手卷烟（手工作坊、卷烟台数与原料销路）[1]、棉花产量与销路（产地、亩产、花行与集散网络）[15]，以及茶业制法与器具结构（手绘构造图与加工工序）[16]。在交通与运河调查中，手稿详细测算了水陆交通的运行细节，包括大车与马车脚钱 、民船种类（航子、麻子、厂船）与载重量、航道水深与通航天数，以及运河沿线厘金局卡的设卡抽税情况 [17]。

（二）外国观察者视角下的基层社会与边疆风貌

作为带有“他者”凝视特征的外国观察者记录，书院调查手稿展现出独特的“他者”视角优势。调查学生不受中国官方立场与传统修志体例的束缚，记录了不少官修方志刻意回避或不曾记载的基层社会与边疆地区实况。

1. 补充官修志书缺失的基础社会细节： 原始手稿以及《中国省别全志》等真实记录了地方城门开闭时间 [18]、城防与通关验执、行会公所的内部规约、运河船夫在曲折航道与浅滩上的实际生计 [19]，以及调查班沿途遭遇土匪袭扰 [20] 与民船停泊 [19] 等真实见闻，为社会史与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珍贵且鲜活的素材。

2. 记录边疆与少数民族区域实况： 书院对内蒙古游牧区、西北丝绸之路沿线以及西南边疆地区的持续调查，留下了关于边疆社会的连续记录。例如手稿中记载了内蒙古地区的羊毛贸易通道 [21][22]、云南滇缅与滇越大道上的马帮运输实况 [23]、鸦片种植与交易数据 [24]，以及新疆与蒙古各王府辖区内的地理、气候、交通与民族风俗 [25]。

（三）军政情报印记与日本侵华战略的历史铁证

从书院档案性质来看，原始手稿最重要、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其作为日本国家级军事与地缘情报刺探工具的历史铁证。与公开出版物极力掩盖其政治军事意图不同，原始手稿及其呈报机制真实暴露了书院调查服务于日本“大陆政策”与侵华战争的本质。

1. 调查报告直接归呈军政决策部门的呈报机制： 书院学生在实地调查后撰写的调查报告书，副本直接送交日本外务省、参谋本部、农商务省。部分手稿上特别标注有“密”“极密”“发表禁止”等字样，证明其属于密级情报文件 [26]。

2. 实地测绘与军事行动的直接对接： 调查手稿包含了大量由学生现场手绘的高精地图。日俄战争前夕的 1903 年，书院学生冈野增次郎受守田利远步兵大尉委托，深入旅顺侦察，绘制“旅顺要塞海陆两正面炮台堡垒略图”，提交日本大本营直接用于日军军事围攻 [27]。1905 年，第二期学生林出贤次郎等人受日本外务省指派，耗时 274 天调查新疆、蒙古，向外务省提交《外蒙古视察复命书》等绝密报告，成为日本外交决策的参考依据 [28]。1916 年第六期学生调查浙江兰溪，重点实测了兰江“舟连四方”的水道与码头；1942 年 4 月浙赣战役中，日军直接调取并利用了当年书院的调查报告，将兰溪列为重点打击目标 [29]。

四、书院原始档案利用长期受限的原因

尽管书院调查手稿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却没有得到学界足够重视，利用程度远不及满铁档案。造成这种局面主要由两方面现实障碍。

（一）藏地跨国分散与版本分割： 书院档案在战后因接收与流转，分藏海内外多家机构，至今缺乏统一的联合目录与跨馆检索工具。如前所述，国图和爱大图书馆大体完成地保存了书院对华调查的原始文本。此外，南京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台湾地区的台湾大学图书馆、台湾地区图书馆、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机构亦有部分旧藏。这种跨国、跨馆的分散保存，极大增加了研究者调阅与系统整理的门槛。

（二）日文草书体手稿识读与专业知识门槛：书院原始手稿大多为战前日文手写体，行草结合、半文半白，加上年代久远，纸张色变，字迹模糊，即便具备较高日文水平者，识读的难度也非常大。同时，手稿内容涵盖金融货币、物产资源、交通运输等诸多领域，不仅词汇与现代日文有较大差异，还存在大量地名抄写错误，需要整理者具备多学科知识背景。

五、书院调查手稿的活化途径

（一）文本对读与版本考证：将国图、爱大藏原始手稿，与《中国省别全志》等公开出版物进行逐篇对读，还原被删除的军政信息与社会细节。

（二）中日史料互证：将书院调查报告与民国地方志（如白眉初编《中华民国省区全志》）、民国各类官方社会经济调查（如陈翰笙农村调查、国民政府实业部农情调查）互证。既借其微观记录补中国史料之缺，又用中国史料校矫其殖民立场偏见与观察误差。

（三）区域史与专题研究深耕：选取长江流域、陕甘地区、内蒙古、大运河等重点区域，结合经济史、历史地理学、社会学开展专题实证分析。比如日本爱知大学藤田佳久教授基于地理学视角，对书院资料做过不少专题研究，可借鉴这类研究思路。

（四）数字人文与知识图谱赋能：运用 GIS 技术重构 700 余条大旅行调查路线；借助 AI–OCR 手写识别，如日本开源工具「みんなで翻刻を」「KuroNet」等，破解日文草书体识读难题；搭建包含人名、地名、物产、行会、调查路线的多维知识图谱，推动从单篇阅读向宏观数字人文发现转变。

六、构建自主学术话语与铭记历史教训

从“二次出版物”回归“一手手稿”，是推进书院史料利用的关键。书院调查手稿具有深刻的双重属性：既以高精度的微观经济与草根生计数据，弥补了传统官修志书的记录盲区；又以密级呈报与实测兵要地图，构成了日本国家级情报刺探的历史铁证。未来研究应立足中日史料互证，借助 AI–OCR、GIS、知识图谱等数字人文技术，推动手写档案的数字化整理与共享，让这批珍稀史料转化为滋养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学术宝库。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谭玉秀 , 李婧 . 东亚同文书院松花江流域森林“大旅行”调查研究 (1916–1935)[J]. 史学集刊 ,2026,224(03):106–118.

[2] 刘燕妮 , 刘志英 . 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新旧转型的调查透视 (1908–1937)[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51(03):316–328+336.

[3] 冯天瑜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 (1)》解说 [Z]. 文化发展论丛 ,2018:47–66.

[4] 周建波 , 陈皓 . 东亚同文书院研究评述及其展望 [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综合版),2021,21(04):37–49.

[5] 冯天瑜 . 中文版前言 [M]//(日) 沪友会编 , 杨华等 , 译 .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00:1–15.

[6] [日] 薄井由 . 东亚同文書院大旅行研究 [M].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7] 王刚 . 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书的制作和流转 (1907–1916)[J]. 文献 ,2025,211(05):62–84.

[8] 国家图书馆编 . 出版说明 [M]//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 . 北京 : 国家图书馆 ,2016:1–3.

[9]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 (全二百册)(2)[J]. 文献 ,2017,(02):43.

[10] 郭传芹 . 东亚同文书院 1927–1943 中国调查资料概述 [J]. 文献 ,2017,(04):182–191.
[11] [日] 東亜同文会編 . 支那省別全誌 (第 1 ~ 3 卷)[M]. 東京 : 東亜同文会 ,1917.
[12] 周杨 . 论东亚同文书院对日本侵华史的作用 [D]. 吉林大学 ,2009.
[13] [日] 二川薰 . 太原、大同、张家口、石家庄的金融状况 [M]// 周建波主编 , 李军、胡竹清 , 译 . 东亚同文书院经济调查资料选译 (金融货币卷).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1–26.
[14] 国家图书馆编 .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 (171 册)[M]. 北京 : 国家图书馆 ,2017.
[15] 冯天瑜 , 刘柏林 , 李少军选编 .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 (下册)[M]. 李少军等 , 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6] 陈琦 . 东亚同文书院的“江西调查”研究 [D]. 赣南师范大学 ,2023.
[17] 冯天瑜 , 刘柏林 , 李少军选编 .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 (上册)[M]. 李少军等 , 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8] [日] 東亜同文会編 . 支那省別全誌 (第 13 卷) [M]. 東京 : 東亜同文会 ,1919.
[19] [日] 沪友会编 .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 [M]. 杨华等 , 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00.
[20] [日] 薄井由 . 清末民初云南商业地理初探——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为中心的研究 [D]. 复旦大学 ,2004.
[21] 国家图书馆编 .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 (105 册)[M]. 北京 : 国家图书馆 ,2017.
[22] 国家图书馆编 .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 (124 册)[M]. 北京 : 国家图书馆 ,2017.
[23] 国家图书馆编 .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 (38 册)[M]. 北京 : 国家图书馆编 ,2017.
[24] 伊东敏雄 . 北满的鸦片 [M]// 周建波主编 , 胡竹清、李军 , 译 . 东亚同文书院经济调查资料选译 (物产资源卷).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56–95.
[25] 冯天瑜 , 聂运伟 , 刘柏林 .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研究 [M]. 北京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5 年 .
[26] 胡文嘉 . 日本军部“新疆回教工作”研究 [D]. 苏州科技大学 ,2021.
[27] 范宏涛 . 从《伊犁纪行》看日野强与新疆 [J].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18,30(06):70–76.
[28] 王建荣 . 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在内蒙古地区的旅行调查 [D]. 内蒙古师范大学 , 2017.
[29] 王振坤 , 张颖 . 日特祸华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谋略谍报活动史实 [M]. 北京 : 群众出版社 ,1988.